

遵义文史资料活页文选

· 2 ·

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2年12月18日

目 录

第八编练部的成立和275师起义的回忆

陈德明……………（1）

迎接遵义解放记事

陈梧山……………（2）

第八编练部的撤销和275师起义的回忆

陈德明

第八编练部的成立和撤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到了1948年冬“淮海战役”（当时国民党军方称为“徐蚌会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方面已形成总崩溃的局势。但南京反动政府还企图划江（长江）而守，继续抗拒人民解放军，并在华南、西南各地区编训部队，准备作垂死挣扎。第八编练部在贵州遵义组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

1949年元月，南京国防部命陈铁在贵州遵义成立第八编练部，先编组一个军士总队，作为组成部队的骨干，我任总队长。按照当时国防部暂定的编制，军士总队辖三个团，其中团、营、连级干部都比步兵团的编制大，人员要多一些，以备日后编为三个师的一个军。军士总队由李益昌、熊先煌和李念荪分任团长。

编练部的各级干部是就地召集在野和闲散的正式军官，士兵则由各级干部在遵义各县招募和贵州兵役部门拨补，到三月间，已招募六千多人。

四月中旬，南京国防部突然电令撤销第八编练部，保留军士总队归国防部直辖，并由贵州绥靖公署谷正伦指挥；编练部召集的军官作资遣处理。第八编练部暂将所有军官编为军官大队，附属军士总队。编练部负责人陈铁于四月下旬去

南京，向国防部接洽处理撤销编练部后遗留的问题。

这里略为提一下，按照当时的形势，南京国防部正在各省编组部队，为何此时又匆忙地将第八编练部撤销呢？这是有关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和贵州地方派系相互矛盾的反映。因为陈铁与卫立煌的关系很深（卫自辽沈战役后，由东北返南京，已去香港），在贵州又非谷正伦的派系，所以不愿意陈铁在贵州率领一支部队。

军士总队准备向人民解放军起义

1949年5月上旬，陈铁自南京经上海返回遵义，我和军士总队三个团长去看他。在密谈中，他对我们说：“编练总队是结束了，保留下来的军士总队能否编成正式部队，还要看以后的形势如何”？陈铁接着说：“我这次去南京替你们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我通过陈又新的介绍，和共军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系，约定等到解放军进入贵州时，我们就响应起义。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我在南京时，顾祝同曾转达何应钦的意思，征求我的同意，要我担任国防部次长，我已辞谢了。他们准备逃往台湾去，到头来还是走投无路。你们不要害怕共产党，共军工作人员对我说，国家统一以后，我们共同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当然也有出路。“听了陈铁说完这些话，我们都感到很惊异。我说：“眼前的问题是军士总队存在和保存待多少时间的问题，谷正伦一向歧视我们，军士总队恐难维持到解放军进入贵州的时期。”陈铁对我们说，他已向共军工作人员建议，请派两个人来贵州指导我们应付当前的局势，便于日后与解放军联系。我们今后只有勉力维持部队、对起义的准备工作要严守秘密、等待时机”。

5月下旬，陈铁对我说：“陈又新自香港来信说，由于交通关系，现刻向贵州运货不便，意思是暗指以前约定由共军派人来贵州指导我们工作的事情，此时不能实现。”过了几天，陈又对我说、“卫立煌由香港来信，问川黔方面生意如何，需要什么货物？”我听了这些话感到很不安，忙问：“卫是用自己的名字写的信吗？”陈说：“不是。但我知道是卫立煌写的信。我感到陈铁不是商人，卫立煌写这样要信要过广州、贵阳，要是被邮电检查机构查出来，必然引起很大的怀疑。我建议陈铁不要回信。当时我更感觉到那位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谷正伦当局，会加快改编军士总队。大约在7月上旬，贵州绥靖公署增几个副主任，内中有陈铁，陈铁得到通知后迟迟不去贵阳就职。我劝他到贵阳敷衍一下，并说：“谷正伦本已仇视我们在遵义组成部队你，现在不就他的副主任，这对军士总队和我们都更为不利。”陈铁生气地说：“他会杀人吗？”但过了两天，经过一番思考，还是去贵阳就了绥靖副主任职。

由于军士总队是归谷正伦指挥，他总是想搞垮这个部队，不发装备、不发补给，我们处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感到无力再维持下去了。8月中旬，谷正伦通过广州国防部命令军士总队拨交给特务武装交警总队，由余万选负责编成两个总队。余为了维持部队，在改编前曾和陈铁商谈，他表示愿意保留原军士总队大多数干部。陈和余商谈后对我说、“交警总队的多数干部和士兵都是原军士总队的，等解放军进入贵州时，你指挥他们起义，作用还要大一些。”我当时只好同意陈铁的想法和安排，因为军士总队的撤销是无可挽回的了。到8月下旬拨交部队时，余万选不愿留用原军士总队的多数干部，并且要我

下令将部队调往桐梓，在川黔边境改编为交警总队，借口是为了便于向重庆方面领运武器装备。我对余万选的这种作法表示消极，故意使部队留在遵义，不向桐梓开动。

275师的成立及起义的经过

1949年9月初，谷正伦去重庆会见蒋介石时，谷电话通知陈铁（电话由遵义专员卢杰转），要他立即到重庆见蒋。陈到重庆见蒋回来时对我谈起他见蒋时的情形，说蒋看见他就先问：“你第八编练部是何时撤销的，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部队？”陈答复蒋说：“只有个军士总队，但已准备拨交给交警总队。”蒋说：“不要拨了，贵州军队太少，能不能编一个军？陈答复：“不能编一个军。”蒋说：“先编一个独立师好了。”蒋立即要秘书电告国防部照办。陈铁在重庆见蒋介石后回遵义才几天，广州国防部即电令将军士总队改编为275师（不是独立师），归驻贵州的49军所辖。49军军长是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兼任。275师在遵义补充一些装备后，于10月下旬开往黄平整训。

275师由遵义开往黄平时，我往贵阳去和19兵团兼49军军长何绍周见面，时陈铁在贵阳，我和他谈贵州当前军事形势，都认为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入贵州，19兵团抵抗不了，必将很快地溃退到贵州西路转到云南边境去。我对陈铁说：“我到黄平后，等解放军进入贵州时，如能先取得联系，就在黄平起义；如联系不上，则将部队开回遵义，再向解放军起义，陈铁同意我的计划，他说，解放军进入遵义前后一些时期，必有短暂的混乱状况。他准备回到团溪区西坪乡间去。

我于11月初由贵阳到黄平旧州时，解放军已进到湘黔边

境，49军用两个师在镇远、铜仁地区布防，275师控制在旧州作该军的预备队。11月8日凌晨拂晓前，49军军部电话紧急通知我，说全军要立即撤退，要275师绕道贵阳向安顺以西行进，再与本军进行联系。我当然不肯依照49军的指示行动，遂决定向解放军起义，按原来的计划采取行动。

这时我判断解放军是乘胜向贵阳挺进，如果联系不上，恐发生误会，我遂决定先返回遵义，再向解放军起义。川军罗广文部队已在遵义驻防，我派人侦知乌江各渡口有川军防守，若直向遵义方面渡河，势必为川军所阻，遂决定绕道开阳，观看形势。再向黔西行进，我率领全师官兵于11月15日到得黔西六广河，得知19兵团和49军直属部队在鸭池河一带沿乌江防阻解放军渡河。我师渡过六广河时，49军即命我在六广河一带布防，我过六广河渡口即密命824团副团长娄恒庸派便衣兵住在河对岸，如解放军来到，即带他们过河来，不许向解放军开枪，并迅速由电话通知我，我已有处理的办法。

275师在黔西驻下后，我立即着手向解放军进行联系，准备在黔西宣布起义。11月18日，我派824团第二副团长陈耀信和副营长陈耀宗着便衣兼程赶往贵阳，要他们去找解放军高级指挥官，向他说明275师是早就准备在贵州起义的，部队现驻防黔西六广河一带，建议解放军改道从六广河渡乌江，不必强渡鸭池河。我还告诉他二人打听陈又新这个人，我判断他可能随军到贵州做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工作，他知道我们是准备起义的。我还告诉陈耀信，“如情况紧急时，我等不到你的回复，我则将部队开往遵义，你们可向去遵义的途中与部队取得联系。”11月20日，我判断解放军

即将进攻49军，强渡乌江。我决定撤离275师担任的六广河一带防线，以瓦解49军河防防线。当即命令担任河防的部队于次日（21）凌晨前撤走，并向金沙县的安底镇集中待命。这是事实上的起义，所以我把275师起义的时间、地点定为49月11月21日在贵州黔西宣布起义。

11月23日，部队到达安底时，尚有一些在黔西后方的师部机关部队没有到来，在安底停留两天后，部队即向遵义行进。在行军途中，得到遵义方面来找275师的和本师留在遵义的人员的消息，知道遵义已经解放；同时派往贵阳向解放军联系起义的陈耀信等人也在途中和我相遇。他们说：“在贵阳见到解放军的赵军长，他是贵阳的一位军事首脑，听说我们的部队有开往遵义的打算。要我们归遵义军分区指挥好了”赵还说：“他将另行通过遵义军分区”。陈耀信等说，“他们在赵军长驻处见到了陈又新，陈又新说，他一进入贵州就到处打听军士总队的消息，现才知道改为275师了。心里很高兴，对赵军长说明了我们部队和解放军联系的经过。”我于28日到遵义先和陈铁，陈又新见面，陈又新是赵健民军长派来遵义工作的，陈铁是陈又新到遵义后向军分区介绍，从西坪乡下接进城来的。我和遵义军分区司令员李程，政委陈璞如和专员公署专员李苏波见面后，军分区要我将部队开遵义龙坪整训。

起义部队参加清剿土匪及整编的经过

我率领起义部队到遵义时，遵义地区初临解放，地方政权尚未巩固，解放军几乎全部入川，各县都发生大小不一的政治土匪的骚乱。遵义军分区决定要我将275师起义部队编为两路，分剿遵义和湄潭两县的匪乱。我以部队起义不久，尚

未经整训，有为难表示。陈璞如政委对我说、“你的起义是早先就和我们（指解放军）有联系，我们相信你的部队，现在军分区派刘震赓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涛主任协同指挥。主要是掌握政策，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这样决定了一路由刘参谋长指挥陈匪石团先开往湄潭，清剿伪县长葛天乙所率领的股匪；一路由任主任指挥李念荪团清剿遵义、桐梓边区和川黔公路遵义地段的股匪；我率其余部队驻遵义郊区，协助城防。剿匪部队于49年12月分头出动，湄潭方面剿匪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基本上肃清了该县的匪患，并活捉匪首、伪县长葛天乙。遵义县方面的剿匪工作，也将川黔公路打通了，各股土匪纷纷向山区逃窜，有的逃往桐梓县境去了。

1950年2月以后，完成解放四川任务的16军陆续开回遵义，遵义军分区遂命275师起义部队集中在遵义四面山营房整编。275师师部已先于50年元月奉命与军分区合并，我调任军分区副司令员。部队在整编中，对培训干部分送贵阳和重庆西南军大学习，规定团以上干部送西南军大，营以下则送贵阳军大。有的干部因家务负担或身体条件差的，准许他们申请还乡生产。起义部队中的青年士兵，身体健壮的编入解放军建制部队。参加学习和留用的干部以及战士们，这些年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他们的力量，有的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在新形势新任务的鼓舞下，更积极地为“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275师起义部队于49年11月底开到遵义时，遵义专署派往正安和道真两县的工作人员，因两县遭受土匪和国民

党残余部队的骚扰，不能前往建立乡县政权，我得悉当时在两县窜扰的国民党军队是宋希濂残部溃入黔东北的，有两个团的番号是227团和228团，统由228团团长江鉴明率领。陈鉴明是我家族中的兄弟，我向军分区领导建议，可以争取陈鉴明起义投诚。陈璞如政委和李程司令员同意派原275师参谋长熊先煜（熊是道真县人）前往正安争取陈鉴明起义投诚。熊于12月初和陈鉴明见面，他得知我已率领部队起义，陈铁也在遵义，遂率领所部两团向解放军起义投诚，并奉命开往绥阳驻扎。遵义专署派往正安、道真两县的工作人员得以前往执行任务。

解放32年以来，党对我的政治学习和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备极关怀，心情舒畅。今年84岁，还担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和遵义市政协要我写这篇率部起义经过的材料，恐因年老力衰，记忆不清，差谬之处，请当时的和知情的同志们指正。

遵义临解放时，地方父老对陈铁和我寄予殷切的期望，调部队保护遵义免遭国民党44军陈春霖部队撤退时的破坏。地方进步人士也关怀我和我所率领的家乡子弟的前途，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希望我不失时机，宣布起义。在此深致感谢之意。

1982年12月4日

迎接遵义解放记事

陈梧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湖南进入贵州边境，四日解放天柱。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整军弃甲曳兵而走。解放军千里急行军，十四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解放遵义。遵义人民盼望解放军的到来，就如大旱之望云霓，终于沛然而降甘霖，人民欢天喜地拥上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舞，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人民好喜欢。”回首三十二年前，此情此景，依稀就在眼前。遵义市政协编印文史资料，要我记下当年的事迹。我就所见所闻和亲身参与的一些活动简述如下，记错写漏，在所难免，请当年知情同志指正。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贵州景况：

一九四九年的元旦，国民党贵州省的党政机关报纸上，登载了贵州反动派头子们不少的狂言恶语：“必须消灭现有无形之匪，就是先要注意肃清共匪”“在贵州潜伏的地下活动分子”。贵州省保安司令部颁布《除奸工作须知》上提出：“决不纵容一个奸匪；”“潜伏活动者绝对严惩。”他们这样毫不掩饰地露出这副狰狞面目，而且已在到处动手杀人。但是、贵州地下党和一切革命的进步群众，并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各地都在前仆后继地开展被反动派所仇恨的“潜伏的地下活动。”我是一九四八年一月被国民党遵义的专员邵陵向贵州省主席杨森密报，经杨森召开精神汇报

会议决定把我由遵义逮捕入贵阳监狱的，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我承认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口供，感谢革命同志和地方亲友多方营救，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才被释出狱。在狱中时，难友们从垃圾堆里拣得一些报纸片断，分析蒋介石的经济王牌金元券贬值，军事王牌付作义倒戈的一日，就是蒋家王朝日落西山，无可挽回之时。出狱回遵义，补听了过去一年的时势变化情况，眼看了市面的混乱局面，预示曙光不久就要降临，要百倍警惕黎明前夕一段最黑暗的时刻，防避反动派的屠杀。

我回遵义的第三天，老朋友潘名挥到我家来，简单叙述了离别后的遭遇，他就要我为贵州地下党领导人写一份《遵义社会调查》，即是遵义当代人物简介。潘名挥从一九三八年一起就在遵义地下党杨天源、谢树中等负责人的影响和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五年他和重庆音乐院的朱石林、陈立华等到遵义搞革命民歌活动，一九四八年和地下党的张立、刘镕铸、施慕仪等有直接和间接的接触，后来和幸必泽有联系。他这时已在中、军统和宪兵特高组的监视下不可能经常到我家，我也不容易到他家去。我接受了潘名挥的嘱托，躲在楼上写材料，写完一页就往瓦桷沟里塞进一页；我的爱人杜龙源坐在楼梯脚做针线，有人进来，就推说我已出街去了。我忙了几个日夜才草写完毕，由杜龙源交给潘的爱人刘丽君去。

四月初，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游行，要求全面公费待遇，国民党指使军官收容队和游行学生发生冲突，藉故镇压学生运动。就在这一事件的几天后，国民党

遵义党政军警特举行全城戒严，突击大检查。潘名挥事前打听了消息，傍晚时分叫他的学生李林来通知我作准备。果然到下一点时分，由保长带来军警数人，一直涌上我父亲住的楼上。这间楼上过去藏有几千册新旧图书，其中古籍部份是我和潘名挥、何其荣集资购买来准备开办图书馆的；所藏的《新华日报》和两箱革命书刊，已在四八年被捕后作了处理。这批军警在楼上搜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浙江大学在遵义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和一本手抄的《唯物辩证法》，那位保长是我族中的哥子，他先走下楼来问我被搜查的书目有无危险？我因病躺在床上，忙叫他设法把黑壳笔记本搞回来。正巧一个青年军官走进屋来对我爱人自报了姓名，说了他和我的朋友们的亲戚关系，他是吴开治的侄女婿姓王，主动提出所搜到的书籍有没有要取出的？我爱人请他取回黑壳笔记本，他就照办了，我赶快拿来放在我睡的床垫下。有一个警察局的督察长要查书登记，连问“还少一本，到哪里去了？”那位青年军官和保长都说：“就是这几本。”才没有追问下去。

第二天，才知道昨夜国民党出动几个组只检查了我家和潘名挥，江承纲，杨天泽，李知群等五家。到江承纲家搜去我借给他的一本《鲁迅全集》；到潘名挥家正要向床头搜时，刘丽君事先把我写的《遵义社会调查》缝在婴儿小被里，她赶忙用被子包起婴儿，掐他一爪，哇的一声哭起来，这场灾难才算躲过了。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和我在贵阳同坐监牢的李光勋，他是桐梓人，早年在北平参加过革命活动，他的干亲家张涛

是国民党刽子手刘伯龙的328师师长，驻扎遵义。张涛把他保释出狱，为了避免再次遇祸，就留他在师部政工处作秘书。有一天，李光勋到我家来说：“遵义警察局长向张涛密报你在遵义搞地下活动，因为刘伯龙要到遵义了解这一类的问题，惟恐这个魔鬼杀人，我已对张涛作解释把你的名字钩掉了！”“光勋要我少出街，注意警特的监视。”“这些时候，贵阳警备司令刘汉珍发表了他的反共“约法三章”，即一，同情，“共匪”者，请往匪区；二、取缔学生扭秧歌；三、禁止收听“共匪”广播。国民党反动派已出现了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我们也更加警惕；不久，328师要调黔西南地区安龙一带防堵解放军，李光勋来说“我要随军远行，自会相机和张涛谈起义的事。解放前夕，张涛在湄隆杀了刘伯龙之后宣布起义。”

二、遵义杰生中学里的斗争

这年五六月间，一块袁大头银元要值一千万金元券；六月九日的报上公布保安会议通过反共救国纲领，各地要成立“反共救国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大厦将倾的险象。遵义的动荡自亦不例外。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一间私立的杰生中学却在杀机四伏中决定开办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在遵义搞白色恐怖，破坏了地下党活动中心老城小学，有的党员被捕，有的隐蔽。有的疏散出省，留下一些群众曾经办起一间私立杰生小学，何其荣这时又向“捐资兴学”的柏继陶建议，再创办一间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杰生中学”，聘我作教导主任。柏继陶接受何其荣的意见，委托他筹备、并聘他作校长。消息刚传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曹文光，中统黔北区主任艾超就找我去谈

话：要请我担任遵义“反共救国动员委员会”秘书。这是他们玩弄的手法，明知我不肯去作这个秘书，却要借此阻挠我到杰生中学任教。我当即表示：“既不想去教书，也不想搞公务。”他们以为达到了阻挠我去作教导主任的目的了。

几天以后，柏继陶请客吃饭，艾、曹作了柏家的座上客。柏继陶在杯酒笑谈中提出要聘我作杰生中学教导主任的事。柏继陶的二弟柏辉章是国民党的一位副军长，才从南京回来不久，报上有条消息请他考虑担任十九兵团副司令。艾曹二人不敢不卖这个账，但是要由他们推荐一个人去作训育员暗中监视我的行动。柏继陶答应了这两人的要求，同时也将这个情形告知了何其荣。何是柏家的女婿，我是参加筹办杰生小学的一员，所以柏继陶对我有关顾之意。艾超派到杰生学去中作训育员的这个人姓卢，是从河南“逃难”到遵义的。他每天形影不离的在我身旁。我在晚自习后回家，他悻悻地表示关心送我走出一条黑巷子。我的爱人提出，要用反监视的革命手段把这个人控制在手里。姓卢的有妻子和一个小孩，我们找机会送点礼物，还请他吃饭，也表示关心他们的生活，到他居住的地方“拜望”。

八月间，长沙已经解放，国民党还派出一个叫黎东方的博士到贵州讲《三国演义》，借题发挥作反共宣传，八月下旬到了遵义，在社会服务处开讲，我们就针对黎东方讲的“娄山关，吊尸岩那样险要，刘伯承是来不了的”等等胡说八道的话，向一群群众揭露这位陈立夫的门下食客的无聊和无耻的行径。遵义（第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卢杰是三月间由兴义调来接替邵陵职务的，他到湄潭，绥阳举行联防会议回来，就到杰生中学

和小学讲演，也是一些反共谰言。我们针对他的叫嚣，向学生介绍了当前的国内形势，巧妙地冲散了这位顽固透顶的专员所散佈的乌烟瘴气。

国民党作了一庄非常荒唐的事：遵义专员公署在九月十日开“二五减租”座谈会，同时成立以卢杰为首的军警宪稽查处。这是根据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公布的《辖区农地减租实施纲要》由贵州省政府布置的活动，这些时候连小学生都知道贵州快要解放，农民快要分田，地主快要完蛋，情势如此，还要以此欺骗人民，真是“其愚不可及也”。到会的都是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偏偏补通知我这位教导主任出席。鲁迅说：“沉默表示最大的愤怒。”对于反动派的花招，只好在座一言不发。

三、二野联络员到遵义布署迎接解放，九月的一天下午医生杨天泽到杰生中学找我低声地说：“天源回来了，在赵俊英那里，他要见你。”天泽是杨天源的五哥，业医。赵俊英是杨天源的爱人。天泽走后，我即离开学校，到赵俊英家去。学校和赵家都是在何家巷里。赵家住的是四合头大院，还有好几户人家住在里面，我进大院时，里面没有人，走进赵三姐房间，他指我座下，就转到帐子背后去，接着杨天源出来，大家会心一笑。他是一九四一年四月由遵义疏散到湖南常德去的。一九四四年冬天，日寇侵入贵州独山，天源和贵州地下党暂住上海的张立联络，准备回贵州打游击。他先到遵义团溪，写信给我探问能不能进入遵义城里活动。我写一封信给他，告知城里情况：党内出了叛徒，国民党要抓你，不能进城。一九四八年他又从常德到遵义，被叛徒夏思民看着了，才赶快从团溪方向转回湖南。这一次回遵义，是他在湖南常德奉第二野

战军联络处命令秘密进入贵州，侦察敌军布署情况。他说：“刘邓大军即将向大西南进军，遵义解放以后改为市，设军事管制委员会。希望你在我军未入遵义前办三件事：一、保护遵义电灯厂，解放后要继继照明；二、保护民铎印刷厂，解放后，要办党报；三、争取很多的人在解放时刻不要听信谣言逃走，再争取敌军起义。解放军入城后，由你（指我）直接向军管会汇报。因为我（指他）回湖南去不一定就能和部队碰头一起回来”。

我说：“你放心，我保证能办到。”同时我告诉他，“潘名挥和幸必泽已在搞迎接解放的活动，要不要将你来遵义的消息转告名挥？”

杨天源说：“可以！”接着说：“我明天就要走了。”我说：“情况很不好，在我身边有人监视。你就赶快走吧！”

我和他分手以后，将上述情形转告潘名挥，潘又告知幸必泽。

杨天源是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秘密进入遵义城里，他还会见晏东藩，要他了解敌军布署情况。晚上还被搜查，幸而躲在帐后，没有被发觉。这时期，国民党贵州省开办“自卫干训团，”遵义各方面的头子先后去接受应变破坏的训练；解放军由湘西挺进，国民党十九兵团开赴黔东“防剿，”保安司令部在贵阳，血腥屠杀贵州大学革命学生史健，镇压学生反饥饿运动。这些情况说明斗争已经十分尖锐，危险性更大但是，我们迎接解放的活动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松劲。我将上述我准备作的一些事和朱振民商谈，他表示高兴，愿意一起活动。朱振民曾任贵州军阀部队改编为国民党新八师的

副师长，一九四五年任遵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曾经叫他的部下没收了步兵学校教官孙玉龙盗窃军用纱布做来出售的蚊帐，孙玉龙是中统黔北区主任鲍沧的打手，鲍沧出面求情发还，朱振民私下说“要借此机会打击这批家伙，决不发还。”一九四八年受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之约，到沈阳作高级参谋。辽沈战役后，陈铁飞上海朱振民在沈阳学习三个月才回贵州。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间的事。朱振民路过贵阳，兴义专员、军统头子廖兴序对他说：“老兄，今后请照看一下！“因为国民党谣传朱振民将要作解放后的贵州民政厅长，廖兴序故意这样来挑逗一下。朱振民将在解放区的见闻和国民党对他注意的情况告知我。我建议他：“暂时缄默，不必谈解放区的见闻，以免遭国民党杀害，他们抓不住把凭，也就不敢对你动手。”他和我去找《民铎日报》经理王葆康，毫不掩饰的讲明了必须保存印刷厂为解放后的宣传工作服务的理由，王葆康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我又单独去找电灯厂经理曾仲常，指明：“如果按照‘自卫干训团’谷正伦的要求爆破电厂，必受惩罚；如果保存电灯厂在解放军入城时继续照明，人民政府将按表现给予保护，并给出路。”我们的讲话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相信他不敢也不肯去密告我们，以后同归于尽。曾仲常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大概是十月二十日左右，有一个叫赵老太太的疯婆子，他是东北义勇军赵侗的母亲，被国民党利用他到各处作反共演说。此人窜到遵义，在播声电影院对各界人士和中小学生对解放军诬蔑一番，我们也分别转告相识的人不要听信国民党的谣言，尽管放心，各安生业。而这时谷正伦还假作镇